

東北流亡女作家的雙重邊緣：

蕭紅《生死場》的女性身體書寫

陳冠琳*

摘要

呼蘭的女兒蕭紅（1911-1942）在初入文壇即以「東北流亡作家」聞名，過去其《生死場》以「抗日作品」作為宣傳，從而導致誤讀與批評，忽略其作品中女性身體書寫之價值。本文旨在透過女性主義理論，剖析《生死場》中身體書寫的開創性，並重新思考女性經驗與民族認同之關係。

本研究將身體經驗分為三個層面：首先，分析蕭紅如何運用「動物化的原始物種擬態」重構身體形象，諷刺父權社會對女體的物品化與審美要求；其次，探討「生產與母職」的刻畫，指出蕭紅將生育視為如刑罰般的苦難，並揭示父權體制下母職受難與父位缺失的現實；最後，剖析女性所面臨的「性別困境」並肯定蕭紅筆下女性的多樣性。

此外，本文在身體經驗的分析基礎之上，援引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一書對民族的探討，論證女性身體經驗與國家之關係，男性霸權所建構的民族敘事在女性身上相對弱化，蕭紅透過《生死場》傳達出：無論戰爭與否，女性始終處於父權與國族的「雙重邊緣」。這種獨有的性別話語，並從當時的社會環境出發，分析蕭紅如何藉由身體描寫，表現出東北人在流亡期間的心理狀態。透過這樣動物擬態的深刻摹寫，使蕭紅從東北流亡作家群體中卓然不群，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關鍵字：女性主義、《生死場》、身體書寫、東北流亡作家、蕭紅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所二年級生。

一、前言

1934 年蕭紅與蕭軍在魯迅的引領下，以《生死場》與《八月的鄉村》成為「東北流亡作家」代表人物，進入了上海文壇。《生死場》得以受到文壇矚目，有賴於魯迅與胡風的序言與後記，卻也因此使之被定調為抗日作品，蕭紅筆下對婦女的關懷與女性身體經驗書寫埋沒在宏大民族主義敘事的洪流之中。九零年代學者劉禾對此進行批判，認為胡風民族主義式的話語與魯迅序言中模糊了蕭紅在《生死場》最關注的其實是「鄉村婦女的生活經驗¹」，二人導致蕭紅作品的誤讀，甚而影響後來評論家對蕭紅的批評與解讀。學者摩羅認為《生死場》被定調為抗日小說主要在於魯迅寫序的抗日視角與蕭軍後來在《生死場》的再出版中，將之與《八月的鄉村》之抗日主題共同討論，這些說法對讀者產生極大影響。事實上《生死場》的前三分之二主要談東北村莊百姓的生老病死，後三分之一才轉入抗日主題，若只從抗戰、左翼文學角度解讀，等同於放棄《生死場》對生命的獨到見解在現代文學史的價值²。學者劉柳書琴肯定劉禾：「顛覆了男性中心的民族國家話語對作品意義的壓制，使《生死場》中的女性話語與生存意識重新被看見³」，並提出魯迅「不言」背後的考量，認為：「魯迅正是洞察了蕭紅在女性和階級話語方面獨樹一幟，在登場之際才設法避免她被相關話語標籤化或吞沒。……流亡作家的登場須符應上海的需要，在魯迅的判斷裡當時上海讀者普遍的關注首先是民族主義式的。⁴」劉柳書琴在〈流亡的娜拉：左翼文化走廊上蕭紅的性別話語〉中剖析二蕭如何形成「東北流亡作家」的文化象徵，探討蕭紅如何演繹一名「出走娜拉」，及其作品與其他東北流亡作家的話語差異。

在劉禾的批評下，蕭紅的女性書寫受到高度關注，其中身體書寫之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學界主要以「生育」、「疾病」、「飢餓」等面向進行探討，孟

¹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新知書店，2008 年 3 月），頁 285-307。

² 摩羅：〈《生死場》的文本斷裂及蕭紅的文學貢獻〉，《社會科學論壇》，2003 年 10 月期，頁 41-50。

³ 柳書琴：〈流亡的娜拉：左翼文化走廊上蕭紅的性別話語〉，《清華學報》第 48 卷第 4 期（2018）：頁 768。

⁴ 柳書琴：〈流亡的娜拉：左翼文化走廊上蕭紅的性別話語〉，頁 769。

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⁵ 中已初步探討蕭紅《生死場》中的女性經驗，並認為蕭紅文本中的象喻、隱喻與明喻將他的女性經驗與群體經驗融合，是女性自我與世界相處的一種符號方式。王學謙、劉森

〈「母親神話」的解構——論蕭紅對母親形象的書寫〉⁶將蕭紅對母親形象的醜化視為「母親神話」的解構，顛覆傳統父權體制中被塑造為慈愛無私的母親形象。林幸謙〈身體符號／物種擬態書寫〉⁷以「物種擬態書寫」的敘述策略探討蕭紅的女性身體符號化與動物擬態書寫，從怪誕現實主義手法與巴赫金醜怪身體之論述，進一步歸納蕭紅的女體書寫不只是單純的將身體形象標籤化，更表現了父權社會與女體的權力關係。劉東玲〈蕭紅小說的身體書寫〉⁸認為蕭紅以女性視角、啟蒙視角與階級畛域的多重融合，拓展了左翼文學表現的場域，其女性身體書寫的廣度與深度，提供女性身體書寫可能面臨的狹隘化、商業化與男性窺視之尷尬窘境之借鑑。

《生死場》前十章以農村生活為主軸，後七章則轉入抗日主題，這種文本上的割裂為人詬病，葛浩文批評這是：「突然缺乏聯繫性質的轉變⁹」，平石淑子更是點出蕭紅作為作家的經驗在書寫民族反抗故事時，還有許多力不從心之處¹⁰。筆者從劉禾對《生死場》「誤讀」之批判；劉柳書琴綜論蕭紅作品中的性別話語，以及林幸謙「物種擬態」研究中獲得深刻啟發。本文將蕭紅身體書寫分為「身體形象」、「生產的身體」與「性別困境」三個層次進行闡述，以學者林幸謙所提出的「動物化的原始物種擬態」為基礎，透過女性主義理論與文本相互參照，剖析蕭紅《生死場》的身體書寫。學界以性別視角探討《生死場》相關論述中，尚缺乏以女性主義理論針對這種「物種擬態」進行系統性分析。「理論」是運用一套具有系統性的「觀點」或「方法」來作為認知分析和

⁵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頁196-219。

⁶ 王學謙、劉森：〈「母親神話」的解構——論蕭紅對母親形象的書寫〉《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1卷第4期（2011年8月），頁67-61。

⁷ 林幸謙：〈身體符號／物種擬態書寫——蕭紅文本的女體／母體寓言〉，《魯迅研究月刊》第8期（2012年8月），頁70-78+69。

⁸ 劉東玲：〈蕭紅小說的身體書寫〉，《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1期（2024年2月）頁55-63。

⁹ 葛浩文：《蕭紅評傳》（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年1月），頁55。

¹⁰ 平石淑子著，崔莉、梁艷萍譯：《蕭紅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頁171。

評論的框架¹¹，筆者以女性主義理論分析文本，並非以西方理論對蕭紅進行批判，而是藉之分析並解讀文本，奠定蕭紅在「東北流亡作家」的特殊性，並以此基礎進一步思考《生死場》中的女性、身體與國家之關係，盼能深化相關論述之豐富度與完整性。

二、《生死場》身體書寫

童年時期的蕭紅受父權壓迫，卻不曾妥協於封建家庭的束縛，多次逃家只為了受教育，因逃家、逃婚與未婚懷孕而不被未婚夫哥哥認可時，她更是勇於提告，向我們展現獨立新女性對受教權、婚姻自主與戀愛自由的追求。而生育的苦楚、女性性自主的威脅與被拋棄的經歷，使她對於女性身份與身體在父權結構中所面臨的困境與威脅有著深刻的體悟，這些經歷讓她在初入左翼文壇時，已站在與其他作家不同的思想層次，透過女性身份寫出有別男性英雄主義式的民族關懷，尤其關注女性苦難與生命經驗。魯迅與胡風皆肯定她作為女性的細緻觀察與纖細感覺，不過蕭紅在故事情節與人物形塑上，則遭受許多批評。如同魯迅在序文中寫道：

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¹²

文中提到「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魯迅曾私下解釋這段文字實際上暗指蕭紅人物描寫的缺陷，只是礙於出版銷路不好明說¹³。《生死場》最大的價值在鄉村底層敘事，並著重描寫女性苦難。因此，本節以《生死場》中的女性身體經驗探討範圍，剖析蕭紅筆下力透紙背的女性苦難與困境。

最早提出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的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主張透過書寫建構專屬於女性的自我認知與經驗，女性得以解構父權體制的框架，重塑其主體性¹⁴。在過去的歷史當中，女人的身體很少被記錄下來，女人

¹¹ 賴俊雄：《批判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十二講》（新北：聯經出版社，2020年7月），頁25。

¹² 蕭紅：《生死場》（臺北：風雲時代出版，2010年8月），頁5。

¹³ 馮雪峰主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251。

¹⁴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8月），頁

的感官經驗與歷史是斷裂的¹⁵。因此，透過獨有經驗之書寫，女性得以扭轉長期在男性凝視與想像中建構的客體形象，找回主體性與話語權，跳脫父權體制的框架。艾德麗安·里奇(Adrienne Rich)認為，只有透過分享私密經驗、甚至痛苦的經驗，女人的聲音才得以嶄露頭角，否則，女人的經驗將持續被排除在文化史之外。只有痛苦才能顯現出女人經驗的特殊性¹⁶。

本節將蕭紅身體書寫分為「身體形象」、「生產與母職」與「性別困境」三個部分，透過女性主義理論探討蕭紅何以動物化的「身體形象」、女性「生產與母職」之刻畫，以及女性面臨之「性別困境」，表現出有別其他東北作家的性別話語。

(一) 身體形象

《生死場》描述鄉村農民貧困與窘迫的生活，不同於一般小說的情節架構與人物塑造，更像是紀錄鄉間人物日常，並著重於女性人物形象與經驗書寫，如一開始登場的麻面婆，就以怪誕形象登場：

汁水在麻面婆的臉上，如珠如豆，漸漸浸著每個麻痕而下流。麻面婆不是一隻蝴蝶，她生不出磷膀來，只有印就的麻痕。¹⁷

305。引自 Hélène Cixous,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in *New French Feminism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1), pp. 334-349。

¹⁵ 沈奕斐：《被建構的女性：當代社會性別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頁152。

¹⁶ 克勞夫 (Patricia Clough Ticineto)，夏傳位譯：《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一版）（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3月），頁75。引自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Norton, 1976), pp. 13-14

¹⁷ 蕭紅：《生死場》，頁10。

麻面婆滿臉麻痕，眼睛「比起牛的眼睛來更大¹⁸」，忙著家務時是「母熊¹⁹」，說起話來像「豬說話一樣²⁰」，急著找羊而感到疲憊時，又像「狗在柴堆上要得疲乏了²¹」，作者藉由誇張的動物描寫醜化女性樣貌，再如老王婆：

她的臉紋綠了些，眼睛發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圓形。有時她講到興奮的話句，她發著嘎而沒有曲折的直聲。鄰居的孩子們會說她是一頭「貓頭鷹」，她常常為著小孩子們說她「貓頭鷹」而憤激：她想自己怎麼會成個那樣的怪物呢？像啐著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她開始吐痰²²

孟悅、戴謹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文學》中指出，文學能夠表達人們的欲望及對欲望的表達，中國古代文人經常以大量形容女性「外觀」之美的描寫，將所寫女性形象「物品化」，像是如花似玉、冰肌玉骨、軟玉溫香等譬喻，女性不僅被視作性對象，也成為了物對象——客體²³。蕭紅女性動物化的原始物種擬態²⁴突破了中國文學中男性中心論述女性形象之傳統，並且透過動物形塑女性，更強化了女性在現實社會卑賤的從屬地位：

房後草堆上，狗在那裡生產。大狗四肢在顫動，全身抖擻著。經過一個長時間，小狗生出來。²⁵

暖和的季節，全村忙著生產。大豬帶著成群的小豬喳喳的跑過，也有的母豬肚子那樣大，走路時快要接觸著地面，牠多數的乳房有什麼在充實

¹⁸ 蕭紅：《生死場》，頁 10。

¹⁹ 蕭紅：《生死場》，頁 10。

²⁰ 蕭紅：《生死場》，頁 12。

²¹ 蕭紅：《生死場》，頁 12。

²² 蕭紅：《生死場》，頁 16。

²³ 孟悅、戴謹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文學》，頁 13-14。

²⁴ 林幸謙：〈身體符號/物種擬態書寫——蕭紅文本的女體/母體寓言〉，《魯迅研究月刊》第 8 期（2012 年 8 月），頁 70-78+69。

²⁵ 蕭紅：《生死場》，頁 62。

起來。²⁶

〈刑罰的日子〉一開始即以大狗與大豬的生產為開端，暗指女人就和動物一般忙著生產，並以動物擬態描寫女人生產的痛楚：

光著身子的女人，和一條魚似的，她趴在那裡。²⁷

因疼痛而無法坐著的女人像魚似的趴在那，難產的產婦像是「患著病的馬一般，倒了下來」²⁸。

……只有女人在鄉村夏季更貧瘦，和耕種的馬一般。²⁹

危及生命的生產與夏季的耕種，使鄉村的女人如馬一般。蕭紅經常運用「馬」暗指女人：

工作來的時候，牠就安心去開始；一些繩鎖束上身時，牠就跟住主人的鞭子。主人的鞭子很少落到牠的皮骨，有時牠過分疲憊而不能支持，行走過分緩慢；主人打了牠，用鞭子，或是用別的什麼，但是牠並不暴跳，因為一切過去的年代規定了牠。³⁰

²⁶ 蕭紅：《生死場》，頁 63。

²⁷ 蕭紅：《生死場》，頁 62-63。

²⁸ 蕭紅：《生死場》，頁 65。

²⁹ 蕭紅：《生死場》，頁 65。

³⁰ 蕭紅：《生死場》，頁 22。

家庭，乃至家族，從它建立的那一刻起，便是以男性為權威，女性的一生都受到家庭規定，婦女的家庭地位塑造其本質與地位³¹。「主人」就像掌握權力的男性，而「一切過去的時代規定了牠」，說的正是這些父權體制下苦於生產、家務並被男性所壓迫的女性。在〈老馬走進屠場〉中的老馬就像王婆：

王婆驅著她的老馬，頭上頂著飄落的黃葉；老馬，老人，配著一張老的葉子，他們走在進城的大道。³²

隨著年紀的衰老，王婆開始同情眼前這匹「老了！」「沒有用處了！」³³的老馬，就如同逐漸老去的自己。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指出這個社會存在一套「衰老的雙重標準」，嚴厲地譴責女性，特別在性吸引力方面表現得最為殘酷³⁴，當《生死場》中的婦女們談論到性生活時，年長的女性感慨道：

「像我們都老了！那不算一回事啦，你們年青，那才了不得哪！小丈夫才會新鮮哩！」³⁵

不只是衰老對女性產生影響，疾病亦然。月英是文本中唯一一個被稱讚美麗、溫和的女子，有著男性所喜好的外貌，然而在生病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起初，丈夫還去求神拜佛，可月英的病越發嚴重，後來索性不管了，嘴裡罵著：「取了你這樣老婆，真算不走運氣！好像娶個小祖宗來家，供奉著你吧！」³⁶，而月英的樣貌逐漸變得怪異起來：

³¹ 孟悅、戴謹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文學》，頁 5。

³² 蕭紅：《生死場》，頁 38。

³³ 蕭紅：《生死場》，頁 39。

³⁴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黃好萱譯：〈衰老的雙重標準〉，《論女性》（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 5 月），頁 24。

³⁵ 蕭紅：《生死場》，頁 40。

³⁶ 蕭紅：《生死場》，頁 48。

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變綠，整齊的一排前齒也完全變綠，她的頭髮燒焦了似的，緊貼住頭皮。她像一頭患病的貓兒，孤獨而無望。³⁷

她美麗的外貌徹底崩塌了，「求神拜佛」不僅顯示農村的迷信，更表現出丈夫壓根沒照顧過她。父權社會中女性要服務於男性，生病而無法服侍丈夫的月英因長期的癱病與疏於照顧，使她的下身長了蛆蟲：

當擦臀部下時，王婆覺得有小小白色的東西落到手上，會蠕行似的。藉著火盆邊的火光去細看，知道那是一些小蛆蟲，她知道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蟲在那裡活躍。月英的身體將變成小蟲們的洞穴！³⁸

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中，女性作為男性慾望的「載體」，下身的腐爛其實也暗指著一個生病、憔悴且無法行動的女人，已經「沒有價值」，不能再被「利用」了。父權社會對女性外貌有更高的要求，當外貌失去光彩，女性的性魅力與價值也隨之降低。金枝離家賺錢時，她聽老人講女人獨自在外要扮老態或醜相³⁹，以避免被日本男人給看上，而這招也奏效了：

沒有一個人理會破亂的金枝，她好像一個垃圾桶，好像一個病狗似的堆在那裏。」⁴⁰

當金枝被日本兵發現時，因骯髒如病狗的樣子而逃過。生態女性主義者沃倫（Warren）指出：「當女人被形容為動物時，便被自然化……而透過將女人自然化，剝削女人也被正當化了……男人會對自然所做的，也會加諸婦女之上。」

³⁷ 蕭紅：《生死場》，頁 49。

³⁸ 蕭紅：《生死場》，頁 49。

³⁹ 蕭紅：《生死場》，頁 104。

⁴⁰ 蕭紅：《生死場》，頁 106。

⁴¹」，亞當斯（Carol Adams）在《肉的性政治學》一書中提到：「物化使動物和女人成為東西……動物被理解成只是活著、尚未被宰殺的食物；女人是男人性滿足的來源。⁴²」蕭紅筆下大量的動物化原始物種擬態不僅象徵了女性的卑賤地位，從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切入，亦可更深入談論女性身體與自然界的生物皆在父權社會中被壓迫，女性與自然有著相似的境遇。

在此補充文本中為數不多的男性動物化的原始物種擬態，首先是二里半弄丟羊氣急攻心時，看到麻面婆煮的焦飯更加憤怒時：

他的面孔和馬臉一樣長。麻面婆驚惶著，帶著愚蠢的舉動，她知道山羊一定沒能尋到。⁴³

雖然被動物化的是二里半，但實際目的在強化麻面婆對丈夫的恐懼。二里半之於老山羊，就像王婆之於老馬，多少有些自我投射與隱喻，父權社會規範的形成，若從人類演化的文明來看，與先天生理氣質、後天環境形成的性別論述緊緊相扣，在重視生產力的農業社會中，男性因身強體壯而需至戶外狩獵、工作⁴⁴，男人是獨立而完整的個體，藉著為群體做的事來確立自己存在的正當性⁴⁵，因此老山羊暗指著瘸腿的二里半在父權社會中的不健全，然而，不健全的丈夫仍使妻子感到恐懼。最後是性慾高漲的成業帶著金枝，「像獵犬帶著捕捉物似的⁴⁶」，此處把成業比喻成獵犬，而金枝直接被物化了。透過這三個例子可以發現，當蕭紅筆下的男性成為動物時，女性仍是他的附屬品，父權社會中的女性總在男性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描寫動物擬態，瘸腿的二里半，對應著老山羊，而富有生產力、年輕的成業，則是行動力十足的獵犬，由此可見蕭紅對這種動物擬態描寫的掌握力。

⁴¹ 王瑞香等作，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臺北：貓頭鷹出版，2020），頁 353。

⁴² 王瑞香等作，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頁。

⁴³ 蕭紅：《生死場》，頁 14。

⁴⁴ 賴俊雄：《批判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十二講》，頁 358。

⁴⁵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邱瑞鑾譯：《第二性》（臺北：貓頭鷹出版，2013 年），頁 708。

⁴⁶ 蕭紅：《生死場》，頁 25。

（二）生產與母職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著名的《第二性》中指出，女性的生殖功能限縮了她的自由，女人因月經、懷孕與生產等阻礙，無法像男性一樣，在性行為中不須承擔風險，有更多的空間，去探索、發明，並透過這些行動建構自己的主體性，卻將女人視為只會生育的工具⁴⁷。在《生死場》中，蕭紅將女人形容成不存在生育主宰權的動物，而女人在生產過程中必須經歷極大的痛楚，男人無須承擔任何苦難：

……受罪的女人，身邊若有洞，她將跳進去！身邊若有毒藥，她將吞下去。她仇視著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願意把自己的腿弄斷，宛如進了蒸籠，全身將被熱力所撕碎一般呀！⁴⁸

《生死場》中的女性對生產毫無喜悅，更多的是痛苦，甚至是恐懼於父權的壓迫：

大肚子的女人，仍漲著肚皮，帶著滿身冷水無言的坐在那裡。她幾乎一動不敢動，她彷彿是在父權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⁴⁹

舊年代農村的醫療條件差，〈刑罰的日子〉中的婦人們如同進入了「生死場」，忙著生，忙著死，而伴隨著生產而來的，是勞動、家務與母職的多重重擔：

「……一個孩子三歲了，我把她摔死了，要小孩子我會成了個廢

⁴⁷ 林芳玫等：《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2000年9月），頁100。（引自 de Beauvoir, Simone 1947/1953. *The Second Sex*. H.M. Parshley, trans. & ed. New York: Knopf, Inc. Books.）

⁴⁸ 蕭紅：《生死場》，頁64。

⁴⁹ 蕭紅：《生死場》，頁64。

物。……那天早晨……我想一想！……是早晨，我把她坐在草堆上，我去餵牛；草堆是在房後。等我想起孩子來，我跑去抱她，我看見草堆上沒有孩子；我看見草堆下有鐵犁的時候，我知道，這是惡兆，偏偏孩子跌在鐵犁一起，我以為她還活著呀！等我抱起來的時候……啊呀！」⁵⁰

王婆繁重的工作使她輕忽了孩子的照顧，起初她的心也覺得難過，但一看到眼前收成得很好的麥子，便一滴淚也沒留下，直到看見鄰人的孩子大了，才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在窮困繁重的工作中，王婆連悲傷的權利都沒有，表現出鄉村農婦的堅韌，當她被迫身兼多「職」的時候，孩子父親的角色始終是缺席的，正如蕭紅童年裡父親總是缺席。在古代社會制度下，父親在家庭關係中總是空缺著，彷彿這一切都是母親的母職一般，對此，基進女性主義者歐里特（Ann Oakley）認為母親是文化社會制約下的產物，是具有壓迫性目的的⁵¹，艾德麗安·里奇(Adrienne Rich)將母職看作男人控制女人的一種「制度」，在父權體制下被界定與限制⁵²。小鐘的死不僅是農村生存問題，更是父權制度對女性奴役的結果。不同於傳統社會歌頌女性生產的生命力，蕭紅深刻刻畫女性生育與隨之而來的酷刑。

（三）性別困境

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發展出男耕女織的性別社會分工，暗示男性在社會生產中所把持的主導地位，以及女性在這樣的分工中被視為輔助角色與附屬。這種分工或許出於自然及男女兩性的生理條件，但在父系社會取代母權制而興起之際，這一分工的內涵已遠遠超出了兩性生理差異，成為整個父系統治秩序的最基礎的一部分⁵³。女性在這樣的結構中，始終處在從屬階級，麻面婆即是典型案例：

⁵⁰ 蕭紅：《生死場》，頁 17。

⁵¹ 林芳玫等：《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頁 140。（引自：Oakley, Ann 1974. *Women's Work: The Housewife,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pp.202-203）

⁵² 林芳玫等：《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頁 140。

⁵³ 孟悅、戴謹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文學》，頁 4-5。

麻面婆的性情不會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時，或是丈夫罵了她，或是鄰人與她拌嘴，就連小孩子們擾煩她時，她都是像一灘蠟消融下來。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爭鬥，她的心像永遠貯藏著悲哀似的……⁵⁴

農村家庭中的家庭主婦在父權結構中的附屬身份，使她的話語權與情緒被壓抑，且受限於此身份位階，女人經常需倚靠男人生存，當家庭中最大的經濟支柱空缺時，女人沒有太多賺錢的能力，身體便成為她們謀生的工具，如《生死場》中的金枝成為寡婦後為了家計被迫賣身。起初，母親叮囑她不能與陌生男性接觸，而當她未婚懷孕時，母親感覺「女兒好像要把她羞辱死了！」⁵⁵，金枝則覺得肚子「變成可怕的怪物」⁵⁶，為了能夠繼承父系血統，中國自古便要求女人的貞節，女人一旦失去處女之身，其「價值」也隨之降低。當她在性交易後得到一點小錢時，母親卻又因眼前的利益催促著她再次進城賺錢：

母親拿著金枝的一元票子，她的牙齒在嘴裏埋沒不住，完全外露……母親不注意女兒為什麼不歡喜，她只跟了一張票子想到另一張，她在想，許多票子不都可以到手嗎？她必須鼓勵女兒。⁵⁷

母親不像女兒有著年輕的外貌以吸引男性，最終只能將女兒的身體視為謀生工具。性交易帶給金枝等人的羞恨，來自父權社會將女性性開放與不檢點連結，「每個新來的第一次『賺錢』都是過分的羞恨」⁵⁸，卻又在金錢的利誘之下，被迫繼續這樣的工作。

第六章《刑罰的日子》所說的「刑罰」，不只是生產的磨難，更是鄉村婦女

⁵⁴ 蕭紅：《生死場》，頁 15。

⁵⁵ 蕭紅：《生死場》，頁 37。

⁵⁶ 蕭紅：《生死場》，頁 28。

⁵⁷ 蕭紅：《生死場》，頁 116。

⁵⁸ 蕭紅：《生死場》，頁 115。

進入婚姻形同地獄一般：

『等你娶過來，她會變樣，她不和原來一樣，她的臉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會打罵她呀！男人們心上放著女人，也就是你這樣的年紀吧！』⁵⁹

嬸嬸這樣勸告成業，因為她也是如此經歷：

女人過去拉著的臂，去撫媚他。但是沒有動，她感到男人的笑臉不是從前的笑臉，她心中被他無數生氣的面孔充塞住，她沒有動，她笑一下趕忙又把笑臉收了回去。她怕笑的時間長，會要挨罵。⁶⁰

當女性進入父權社會的婚姻制度中，即成為男性的附庸與被支配者，在經濟與權力關係中仰賴男性主導，滿足男性的需求與慾望。感受到丈夫婚後差別待遇的她「與年輕的婦人絕對隔礙著⁶¹」，再一次演示著社會對「衰老的雙重標準」。婚後的成業也真如嬸嬸所言：

「把你們都一塊賣掉，要你們這些吵家鬼有什麼用……」⁶²

當成業經濟壓力沈重時，回到家便把怨氣發洩在金枝母女身上，甚至真將女兒小金枝給摔死了。這不僅顯現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卑微地位與無權無能，更表現出父權對男性的壓迫，再轉向到女性身上，進而爆發一場人倫悲劇。中國男人如此，日本男人也不將女人看做一回事，一樣地貶低、玩弄著女人：

⁵⁹ 蕭紅：《生死場》，頁 25。

⁶⁰ 蕭紅：《生死場》，頁 27。

⁶¹ 蕭紅：《生死場》，頁 27。

⁶² 蕭紅：《生死場》，頁 78。

還沒走出欄門，他們就調笑那個女人。並且由王婆看見那個日本「銅帽子」的手在女人的屁股上急忙的爬了一下。⁶³

本就屬弱勢的女性在戰爭中更是悲慘：

「哈爾濱一定比鄉下好，你再去就在那裡不要回來，村子裡日本子越來越惡，他們捉大肚女人，破開肚子去破『紅槍會』（義勇軍的一種），活顯顯的小孩子從肚皮流出來……」⁶⁴

從中國男人到日本男人，女人的地位沒有任何改變，孕婦更是加倍的悲慘。承業過世後，成為寡婦的金枝被迫得出去工作，作者並未詳述成業過世的原因，而是直接以「年輕的寡婦」稱呼金枝，成業可能是為抗日所犧牲，此處又顯現了作者更著重關注女性在戰爭所面臨的困境。

西蒙·波娃曾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後天塑造出來的。雌性的人在受到社會薰陶後表現出來的女性形象，並無法以生物的、心理的、經濟的先天條件來界定……⁶⁵」。波娃對女性身體的負面態度為後來女性主義者駁斥，在拒絕所謂的陰性本質時，也不應落入「唯名論」的陷阱，以免連女性行為及經驗的真實差異都否認⁶⁶。值得肯定的是，以性別二元區分男女，「陽剛」與「陰柔」的絕對劃分是社會所建構的刻板印象，並非所有男人、女人都是絕對的「陽剛」與「陰柔」，在《生死場》中以王婆最具特殊性，當月英癱病臥床而不被丈夫照顧時，她主動前往探望，並替月英洗澡，展現女性之間深厚且令人動容的情誼；在丈夫趙三需要資源時，她幫他找來了槍，還教他如何裝火藥、上炮子，不僅使趙三驚訝於妻子的膽量，更讓他對她感到敬重；

⁶³ 蕭紅：《生死場》，頁 90。

⁶⁴ 蕭紅：《生死場》，頁 116。

⁶⁵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邱瑞鑾譯：《第二性》，頁 487。

⁶⁶ 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二版（臺北：商周出版，2023 年 2 月），頁 98。

因得知兒子死訊自殺時，王婆的死而復生象徵其頑強的生命力。她深知丈夫趙三的懦弱與無用，敢於批評丈夫：「我沒見過這樣的漢子，起初看來還像一塊鐵，後來越看越是一堆泥了！」。女性所居處的文化與社會，將女人定義為他者與男性的附屬物⁶⁷，在歷史、社會與文化結構的形塑下，女性的個人特質被壓抑，從而鞏固柔弱的刻板印象，然而，這並不代表女性不可能有果敢、幹練與獨立的特質，王婆有勇有謀、身強體魄，有其陽剛的一面；失去孩子的悲痛與幫助月英時的柔軟，則表現出陰柔的特質，這不僅表現出蕭紅筆下女性的多樣性，也可視為女性對父權結構的反抗。

三、女性、身體與國族認同

本節將分為兩個部分，首先談女性與國族認同的關係，接著討論蕭紅筆下國族與身體間的隱喻。

（一）女性與國族認同的關係

劉禾在指出《生死場》中的「貧窮、無知、階級剝削、帝國主義以及父權制皆達成共謀關係，試圖使農村人民，特別是婦女，降低到動物的生存層次⁶⁸。」小說中原先懦弱、無用的趙三從不知道何謂國家：

趙三只知道自己是中國人。無論別人對他講解了多少遍，他總不能明白他在中國人中是站在怎樣的階級。雖然這樣，老趙三也是非常進步，他可以代表整個村人在進步著，那就是他從前不曉得什麼叫國家，從前也許忘掉了自己是那國的國民！⁶⁹

鄉村的愚夫透過民族國家的話語，發現自己作為中國人的存在⁷⁰。筆者援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之概念，安德森認為民族：「是

⁶⁷ 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頁 102。

⁶⁸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頁 290。

⁶⁹ 蕭紅：《生死場》，頁 101。

⁷⁰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頁 297。

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⁷¹」，法國歷史學家歐內斯特·赫南(Ernest Renan)指出：「民族即是一種想像，本質在於每個人都會有許多共同的事物……⁷²」，而這個民族大多建構在男性霸權的社會中，原先對抗日興趣缺缺的二里半成為鰥夫以後，「貪戀別人的家庭。⁷³」，無法再在家庭中發揮作用，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好像一切都有了希望⁷⁴」。從趙三與二里半的行動中，可看出男性如何透過民族話語重新塑立其價值。本文認為這種共同想像在女性身上較男性更為弱化，無論是制度、社會與權力，女性始終處在邊緣化的位階，總被掩蓋在歷史敘事中。而在《生死場》中則體現在金枝身上：

「從前恨男人，現在恨小日本子。」最後她轉到傷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國人呢？除外我什麼也不恨。」

《生死場》中的金枝連自身的性別困境都未能解決，更遑論無論是誰的統治，女性的苦難始終存在。

女性身體先天條件略弱於男性，蕭紅因生產而更加脆弱的身子，自然無法透過親身經驗，將戰爭場面寫得栩栩如生。本文認為以此評價蕭紅作品之價值有失公允。蕭紅透過《生死場》欲傳達的要旨，乃在女性在現實生活中所面臨之苦難，是不分戰爭與否都在發生的，而抗日題材的斷裂感，則強化了戰爭的突如其來與措手不及。

（二）國族與身體

先前論述中，筆者從女性主義理論視角，整理出蕭紅動物擬態描寫下的人物。上一小節中筆者分析金枝在講出自己「恨中國人」，背後隱含著女性在當時社會環境下的處境，此節接續從當時的政治、歷史來看。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日本建立「滿洲國」進行統治，因其境遇與處境與各地有

⁷¹ 班納迪克·安德森（Anderson,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5月），頁41。

⁷² 班納迪克·安德森（Anderson,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5月）（引自赫南（Ernest Renan），〈*Qu'est-ce qu'une nation*〉收於《全集》（*Euvres complètes*），第一冊，p.892。），頁41。

⁷³ 蕭紅：《生死場》，頁125。

⁷⁴ 蕭紅：《生死場》，頁125。

所差別，常有依附而無歸屬之感。東北流亡意識中帶有複雜情緒，不僅是仇日，更隱含著對中央的不信任⁷⁵。對日本人的仇視來自於日本的侵略，對中國人的憎恨在於中央的不抵抗政策斷送了東北這塊土地⁷⁶。根據黃金麟在《歷史、身體、國家》一書中指出：

二十世紀初葉，隨著中國國勢的低落以及之前各項軍事與政經改革的失敗，改造國民的身體與思維開始成為一個緊迫的工作。這種將身體的改造視作為國家改造的前提，使身體在二十世紀初葉變成一個眾所矚目的焦點。

知識分子推動身體改造，強調以身體為國富種存之基礎，以身體改造作為國家改造的前提⁷⁷，「身體的『殖民』權利由家庭和禮教體系轉移到國家的手上⁷⁸。」當身體的成為「國家權力的從屬物⁷⁹」，蕭紅筆下身體的殘缺、衰敗，似乎也隱含著東北人在這個戰爭中所面臨的流亡處境與無所適從的心理狀態。從羅圈腿、成業、二里半、趙三、王婆、麻面婆、金枝、月英等角色的刻畫，再再顯示這片土地的荒涼與悲哀。開場的男孩羅圈腿，有著殘缺的身體；象徵國家棟樑的年輕人——成業，在戰爭中死去，再到年輕貌美卻因癱瘓而導致下體潰爛的月英，都暗指著國家未來主要生產力的不健全，這種對國族的悲觀心理，透過人物身體的描寫表現出來。

四、結論

呼蘭的女兒蕭紅短短三十一年的人生中經歷了無數的磨難，無論是生育、流浪、戰爭、逃亡，甚至是染上肺結核，她都未曾停筆，寫下了近百萬的文字，文學不僅是她賴以維生的求生工具，更是苦難的棲身之地。

⁷⁵ 吳振漢：〈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桃園市：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992年卷10），頁108-110。

⁷⁶ 易顯石等著：《九一八事變史》（新北市：谷風出版社，1987年2月），頁185。

⁷⁷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臺北市：聯經出版社 2001年1月），頁24-26。

⁷⁸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頁28。

⁷⁹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頁50。

本文汲取前人研究並深入剖析，發覺蕭紅透過女性動物化的原始物種擬態，乃是對於中國文學中男性中心論述下，女性傳統形象之顛覆，以生態女性主義者沃倫（Warren）與亞當斯（Carol Adams）的論點看，女性與自然有著相似的境遇。從女性視角切入蕭紅的男性的動物化描寫時，發現當她筆下男性成為動物，女性仍是其附屬品，透過分析文本對年輕男人與老男人的物種擬態描寫之差異，更能發現她對這種摹寫的高度掌握。曾經經歷生育的蕭紅筆下的生產不似傳統社會對生命力的歌頌，而是如生死場一般的刑罰，筆者透過女性主義者歐里特與里奇之論述，指出父親在家庭關係的空缺，導致「母職」的失職，乃是父權對女性奴役的結果。從小在封建家庭長大的她，描寫性別困境字字珠璣，形塑出麻面婆、金枝等悲劇性質的女性角色，王婆的剛柔並濟則跳脫二元性別刻板印象中的女性，表現女性性格的多樣性。最後筆者援引安德森所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與赫南之論述，探討趙三、二里半與金枝，乃至於蕭紅自身對民族的認同，並認為男性霸權所建構的民族想像在女性身上較為弱化，且女性長期處在失語、被邊緣化的狀態。產後始終處於體弱狀態的蕭紅自然是無法將戰爭場面寫得繪聲繪影。從國族與身體的視角，則可看出她如何運用身體描寫展現出東北人在流亡之際的心理狀態。當所有人將精力投注在以男性主體敘事時，蕭紅以女性共同的經驗描寫，向我們傳達了無論戰爭與否，女性始終困在父權的牢籠之中。她所展現的女性關懷，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並從「東北流亡作家」中脫穎而出。

五、參考文獻

1. 專書：

馮雪峰主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易顯石等著：《九一八事變史》（新北市：谷風出版社，1987年2月）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臺北市：聯經出版社 2001年1月）

〔美〕班納迪克·安德森著（Anderson,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5月）。

〔美〕克勞夫（Patricia Clough Ticineto），夏傳位譯：《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一版）（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3月）。

林芳玫等：《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2000年9月）。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 5 月）。

沈奕斐：《被建構的女性：當代社會性別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4 月）。

〔日〕平石淑子著，崔莉、梁艷萍譯：《蕭紅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0 月）。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新知書店，2008 年 3 月）。

蕭紅：《生死場》（臺北：風雲時代出版，2010 年 8 月）。

〔法〕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邱瑞鑾譯：《第二性》（臺北：貓頭鷹出版，2013 年）。

葛浩文：《蕭紅評傳》（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 年 1 月），頁 55。

賴俊雄：《批判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十二講》（新北：聯經出版社，2020 年 7 月）。

〔美〕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二版（臺北：商周出版，2023 年 2 月）。

〔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黃好萱譯：〈衰老的雙重標準〉，《論女性》（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 5 月）。

2. 引用論文：

期刊論文：

吳振漢：〈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992 年卷 10。

摩羅：〈《生死場》的文本斷裂及蕭紅的文學貢獻〉，《社會科學論壇》，2003 年 10 月期，頁 41-50。

王學謙、劉森：〈「母親神話」的解構——論蕭紅對母親形象的書寫〉《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1 卷第 4 期（2011 年 8 月），頁 67-61。

林幸謙：〈身體符號/物種擬態書寫——蕭紅文本的女體/母體寓言〉，《魯迅研究

月刊》第 8 期（2012 年 8 月），頁 70-78+69。

柳書琴：〈流亡的娜拉：左翼文化走廊上蕭紅的性別話語〉，《清華學報》第 48 卷第 4 期（2018），頁 763-796。

劉東玲：〈蕭紅小說的身體書寫〉，《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1 期（2024 年 2 月），頁 55-63。